



新闻出版优秀博士论文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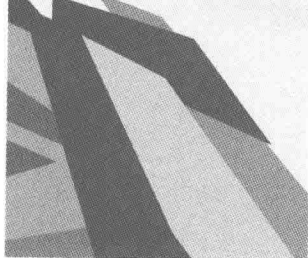
治学与治己： 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

*Academia and Self-cultivation:
A Research on Prof. Fang Han-qi's
Academic Road*

刘泱育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新闻出版优秀博士论文文库

治学与治己： 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

*Academia and Self-cultivation:
A Research on Prof. Fang Han-qí's
Academic Road*

刘泱育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 / 刘泱育著. —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 - 7 - 5068 - 3761 - 3

I. ①治… II. ①刘… III. ①方汉奇—人物研究

IV. ①K825.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2298 号

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

刘泱育 著

责任编辑 许艳辉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3A 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yywhbj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26.2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3761 - 3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南京财经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新闻出版优秀博士论文文库”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郝振省

副 主 任 魏玉山 范 军

执行主任 王 平

委 员 王 平 王 飏 刘兰肖

刘拥军 李晓晔 张 立

张晓斌 范 军 赵 冰

郝振省 郝 捷 徐升国

魏玉山

题 辞



这是一部精心之作。

刘革奇



2011年10月30日

摘 要

对于任何一位高校教师而言，如何做一个有贡献的学术探索者，如何做一名有影响的研究组织者，又如何做一位有声望的人才培养者，这既是个体心里的企望，也是全体直面的难题。

本书以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的学术之路为研究对象，发现“兴趣为业”、“与时俱进”、“与人为善”和“角色均衡”——这“四项基本原则”，既是共和国学者扮演好“学术的探索者”、“研究的组织者”和“人才的培养者”，因而“以学术为乐业”的必要条件，也是任何个体追求和践行一种幸福生活方式的必要价值理念。其中，以“兴趣为业”的前提是“认识自己”，而“与时俱进”、“与人为善”和“角色均衡”则皆需以“修身为本”。

作者认为，方汉奇学术之路的最重要的价值，并不是如何思想和行动才能做好学术研究，而是作为一种经验事实，让我们有理由重新思考和高度重视中西方文明传统中的“认识自己”和“修身为本”。

由于“认识自己”——进而选择“性之所近”的职业，是个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社会功能、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条件，因而，“以学术为乐业”，其前提是所选择的“学术”与自己“性之所近”。这等于说，并不是任何一个人人都适合从事学术研究。

通过研究方汉奇的学术之路，本书发现，无论社会环境和个体年龄如何变迁，个体从来都不缺乏选择的自由。因而，对于任何个

体而言，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之上，重要的问题和核心的任务便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和年龄阶段之中，评估和利用自己此时所拥有的选择的自由，通过“修身”去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关键词：高校教师 社会角色 方汉奇 认识自己 修身

Abstract

For any teacher in an university, how to be a contributive explorer of the academic? how to be an influential organizer of the research as well as a reputable culturist of the talents? It is not only the desire of any individual, but also a difficult problem to all.

In order to answer the above mentioned questions, by focusing on the academic road of the Emeritus Professor Fang Han-qi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is book finds that there ar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doing matter not only in playing the social roles of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but also in pursuit of a happy life of any person, they are: Choosing job for hobbies,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Showing kindness to others and Playing social roles balancely. Among them, Knowing oneself is the premise of Choosing job for hobbies,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Showing kindness to others and Playing social roles balancely mean Self-cultivation.

By studying the academic road of Prof. Fang Han-qi, in the view of the author, the most impotant thing for anyone is not engaged in academic research by thinking as well as acting correctly, but to know oneself and improve oneself. Just as it were emphasized by the great thinkers in the Ancient Greek and Ancient China.

Through discussing the importance of Knowing Oneself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reedom of choosing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is book draws

out the conclusion, that is, as soon as a man known himself, it is crucial for him to improve himself in order to achieve himself utmostly.

Key words: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Social Role; Prof. Fang Han-qi; Knowing Oneself; Self-cultivation

序 言

刘泱育博士的《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就要列入中国书籍出版社“新闻出版优秀博士论文文库”出版了。在学术著作出版普遍较为困难的当今，作为新闻史学的同行和曾经的导师，实难掩饰发自内心的喜悦，致以真诚的祝贺。

(一)

据笔者所知，在中国新闻学界较早开展新闻史人物研究的是黄天鹏。1931年，黄天鹏所著的《新闻记者的故事》（署名黄梁梦）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该书32开，共124页。包括梁启超、章炳麟、邹容、蒋智由、于右任、戴天仇、邵力子、叶楚傖、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张一苇等人的故事共26篇——这似乎是目前所见对中国新闻人物的第一组群像性研究介绍著作。黄天鹏同年还出版了《新闻记者外史》（署名黄梁梦）一书，收录《新闻记者社会地位的今昔》、《伦敦泰晤士报的佚事》、《美国新闻记者的预言》等23篇有关中外报纸和新闻记者的轶事、趣话——这是前一种著作的姐妹篇，可以看作是对外国新闻记者的群像性介绍。至于说到为单一新闻史人物撰写出版研究专著的研究，据目前所知是英国人梅益盛，他撰写的《马礼逊传》（周云路译述）一书，于1932年由上海的文化书局出版。（上述信息来源于周伟明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8年版)。大概由于战争气氛日浓——1932年时,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前奏东北“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及后来的连续战争和政权更迭,在建国前再也没有看到有新闻史人物研究专著出版的记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多年间,新闻史人物研究在中国新闻史学界走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在《60年来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现状及对策》一文中认为,在1978年以前的那一段时期,受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组织者、鼓动者”这一观点的影响,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新闻史人物研究开展得很不够。直到方汉奇先生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才“打开了局面”。该书在正文中列举出姓名的近代报人就不下1500人,对其中知名度较高、贡献较大的还设置了专节或专目,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新闻年鉴》从1982年起开设“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专栏,每年介绍100多位新闻界名人,几十年来介绍的新闻界名人已经有3000多人。2002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从《中国新闻年鉴》(1982-2001)“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中介绍的人物中选出2500个新闻界人物,集结成册,以《中国新闻界人物》为名,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而后又先后出版了诸如王艾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名记者小传》(1989)、郑贞铭《百年报人》(1990)、颜景政主编的《中外名记者丛书》(共10本,1996-1998)、曾宪明《中国百年报人》(2003)以及李彬、涂鸣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新闻人》(2007)等群像式研究新闻人物的专著。在新闻界人物群像式研究迅速发展的同时,对新闻界人物的个案研究也蓬勃开展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出版了一大批新闻人物个案研究专著,如《黎烈文评传》(康永秋,1985)、《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徐铸成,1986)、《浪迹天涯:萧乾传》(李辉,1987)、《陈布雷

外史》(王泰东, 1987)、《范长江传》(方蒙, 1989)、《一个毕生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人: 邓拓传》(顾行、成美, 1991)、《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寄丹, 1995)、《爱国报人维新志士: 彭翼仲》(姜纬堂, 1996)、《林白水》(王植伦, 1996)、《邵飘萍传》(华德韩, 1998)、《现代报业巨子: 史量才》(庞荣棣, 1999)、《赵超构传》(张林枫, 1999)、《曹聚仁传》(李伟, 2004)、《穆青传》(张严平, 2005)、《王韬评传》(张海林, 2007)、《张季鸾与大公报》(王润泽, 2008)、《陈德铭、邓季惺与新民报》(杨雪梅, 2008), 等等, 真是蔚为大观, 硕果累累。既是新闻史学界人物研究丰盈实力的生动体现, 更是弘扬新闻学界优良传统的实际需要。

尽管还不是一览无余地列举自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产生的新闻界人物研究的所有成果(有些成果或是因为文字篇幅没有列举, 也有些成果本人还没有得知)。但总览这些研究成果却发现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这些著作所记载、介绍及研究的新闻界人物都是“昨天”的活人, 而非“今天”的活人, 即上述人物传记著作中的传主都是已经故去的新闻史人物。如上所述著作所研究的传主如黎烈文、张季鸾、萧乾、陈布雷、范长江、邓拓、胡文虎、胡仙、彭翼仲、林白水、邵飘萍、史量才、赵超构、曹聚仁、穆青、王韬、陈德铭、邓季惺等等, 都是已经不在世的新闻界人物, 没有一个是尚健在的新闻界人物。第二是研究者所利用的研究素材都是以往文献记载的历史信息。尽管不乏传主在世时撰写的专著、论文或新闻作品, 以及接受采访、交流等当时来说是鲜活的第一手材料, 但在研究者利用的时候毫无疑问已经属于历史的材料而非鲜活的素材。例如杜素娟的《沈从文与大公报》一书中选用了 130 多幅照片、书影, 但全部是历史的照片。又如胡玫、王瑾编的《回忆胡政之》的目的是“打开追忆之门”; 庞荣棣著的《申报魂: 中国报业泰斗史

量才图文珍集》，在她收集到的 2000 多幅照片中选择了 200 余幅，使得此书很有历史价值——但是传主鲜活的素材却少之又少，不免使人有点遗憾。第三是研究者对传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没有与传主的直接交流和沟通，属于研究者单向的文献解读和个人分析。由于是个人单向的文献研究，所以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同一细节在不同的研究者成果中就会出现不同的解读——因当事人已无法以亲身经历证是或证非，只好由不同的研究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而成为学术研究的“悬案”。

(二)

对于这个现象，学术界有识之士早就大声疾呼，力求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还在 1981 年，年方 56 岁的方汉奇先生就在《加快新闻史研究的步伐》（载《新闻战线》1981 年第 11 期）一文中呼吁加强新闻史人物研究第一手材料的“搜集和抢救工作”。因为“一些早期参加革命报刊工作的老同志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报人，年事已高，要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把那些蕴藏在他们记忆中的宝贵资料挖掘抢救出来”。次年他又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呼吁“加强新闻史人物的研究”，“去世的新闻人物要研究，目前还健在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的有关材料也可以先着手搜集起来，以便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方汉奇文集》第 31 页）。2009 年，乔云霞教授在“中国新闻史学会 2009 年年会暨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把新闻界人物研究中的“研究死人多活人少”的现象视为“60 年来新闻界人物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并“究其原因：其一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难识庐山真面目。由于多方面原因，太近了的事情反而难以看准。其二是评说人物太敏感，容易引发人际关系紧张，甚至政局不稳”。正是在这种社会学术氛围中，对于健在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就明显显

得不够。到目前为止，只有原鹏在《穆青新闻论》（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1999 年硕士学位论文）中从“新闻作品”和“新闻理论”两方面研究过穆青；刘聪贤的硕士学位论文《艾丰经济报道研究》研究了艾丰的“经济报道写作技巧”及借鉴意义；李九伟在《范敬宜新闻思想和总编思想初探》（河南大学新闻专业 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范敬宜的新闻思想和总编思想。在博士学位论文方面，据笔者所知，第一个研究新闻界人物的是庞亮，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声屏世界里的思想者：梅益广播电视宣传思想研究》（中国传媒大学 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紧跟其后的是王咏梅的博士学位论文《新闻巨子胡政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专业 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志强的《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及其实践研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专业 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也是研究的胡政之。至少到目前为止，本人还没有得知有研究尚健在的新闻学界人物的博士学位论文。

刘洪育 2008 年入学攻读博士学位后，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选择具有很大挑战性的“方汉奇 60 年新闻史学道路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为什么他要冒或是“阿谀奉承”，或是“失之恭敬”的风险做这个选题呢？主要是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汉奇先生及其学术道路具有典型社会意义。首先是作为“自然人”的方汉奇在其已经走过的 80 多年历程中，从踏上社会的第一步起就选择了新闻史研究的道路，而且一走就是 60 多年，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新闻史研究的成果贡献社会，每一个阶段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又都烙上了鲜明的社会和时代烙印，成为认识中国社会 60 年发展历程的见证人，折射了中国社会在 60 年间经历的巨大时代变迁历程。其次是作为“社会人”的方汉奇代表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在 60 年间的政治学术和心灵历程。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是从旧社会过来、真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受思想改造、但受到过

不公正对待，改革开放后获得政治学术新生，为中国新闻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再则是作为“学术人”的方汉奇及其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间的新闻史学道路，再现了中国新闻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轨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新闻史学研究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作为“学术人”的方汉奇先是出版第一本专著《中国近代报刊史》（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新闻史专著），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并担任召集人，主持成立国家级学术团体“中国新闻史学会”并任创会会长，牵头编纂出版了诸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在中国新闻史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组织了多次新闻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创办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刊《新闻春秋》，指导新闻史博士研究生等等。尽管这都是他个人的活动，但这又是在改革开放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的个人活动（在改革开放前是绝无可能的）。因此这些活动以及活动者本人也就具有了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社会属性，折射出中国新闻史学科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历程，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三）

刘洪育的博士论文共有七章（引论加六章正文），本书是以论文的第三、四、五章为基础修改充实而成的。读毕全书文稿，觉得有以下几点印象：一是选题有代表性。研究方汉奇先生六十年学术道路，就是通过研究方汉奇先生的学术道路，探索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知识生产的独特规律，思考知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与社会、社会环境、社会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其研究的社会和学术价值应当说远远溢出了方汉奇“这一个”人的范畴。

二是论述重点突出。本书选择了方汉奇先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主要学术活动，分“学术探索之路”、“组织研究之路”和“人才培养之路”三编予以展开。其间既顺带介绍了有关背景和相关人物和活动，但着重于方先生在学术探索、组织研究和人才培养这三个方面——这既是高校教师和新闻史学者方汉奇的主要社会活动，也是社会环境与社会知识分子关系变化的主要领域。抓住了这三个方面，就抓住了方汉奇在这三十年间的活动主线，抓住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收到研究“一个人”的学术道路折射“全社会”发展进步的纲举目张效果。三是研究方法独特。主要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大胆应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据介绍，在构思撰写和修改论文过程中，他和方先生的电子邮件交流达200多次，其中方先生发给他的电子邮件就达130多封。无论是在博士学位论文还是本书中，作者都引用了和方先生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大量电子邮件、交谈录音等原始素材（论文素材的真实性得到方先生本人的认可）。从写作的意义上讲，这些第一手素材具有唯一性论据的价值，而从保存珍贵史料角度而言，采用“口述史”方法获得的史料对后人的研究或许也有特殊的价值。四是努力直面历史。面对被新闻史学界称之为“泰斗”的方汉奇先生，作为“小字辈”的刘泱育当然应该是崇敬有加。但作为研究者刘泱育和研究对象方汉奇之间，则不应该只有“崇敬”，否则就失去了研究的本义和价值。读完全稿，尽管还不能感到十分满意，但已可感觉到他的十分努力。这种努力的主要方式是：首先是以“后方汉奇”否定“前方汉奇”。如对《中国近代报刊史》的评价。采用方汉奇自己认为《中国近代报刊史》“基本上还是采用了按政治运动分期的那种体例”，“它受旧的影响多一些，新闻业史的特点还不那么突出”，“每一章都是什么什么报为了什么什么而斗争，和党在当时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紧密联系”（《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与建议》），从而指出该书在写